

# 汉武帝“甘泉卤簿”有无“黄门鼓吹”考

——基于政治文化及制度史的考察

谢芳<sup>1</sup> 李禹阶<sup>2</sup>

(1.莆田学院 音乐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黄门鼓吹”作为朝廷礼制中的重要部分,其在武帝朝的确立体现出一种新的礼制建构及政治权力观念,也反映了西汉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演进历程。本文从制度史维度,爬梳“甘泉卤簿”所涉车舆制度、服色制度、郊祀制度的变革情况,围绕改制时间、要素、理念、历程,讨论汉武帝朝与“黄门鼓吹”“甘泉卤簿”三者交集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认为“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利用“甘泉卤簿”宣扬改制理念,展示集权建制成果的礼仪之器、必备之物,在汉武帝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汉武帝;甘泉卤簿;黄门鼓吹;服色制度;郊祀制度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049-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05

西汉国家政治制度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帝制国家的制度与文化基础,对此学者们曾有不同的认识。例如熊十力先生就认为:“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重汉代也。”<sup>[1]766</sup>何怀宏先生认为秦朝统一后,由于“没有确立一种比较符合人性和人道的统治思想,也没有解决传统统治阶级的再生产问题,反而继续迷信暴力专制,以打天下的方式来治理天下,故此很快分崩离析,‘二世而亡’。而后来的汉朝终于通过儒家解决了这两大问题。所以,我以为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是,传统中国的两千年间,非‘秦制’也,而是皆为‘汉制’,而且是经过了‘周文’洗礼和落实的‘汉制’”<sup>[2]16</sup>。这些学者对于中国帝制时代国家制度与政治文化的认知,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由于秦汉之际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化,使汉代国家体制在继承、改造秦旧制基础上,进行了大范围的制度创新。其制度建构的内容虽然仍以旧秦制度为基础,但是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则来自自由儒家学者所改造的周代礼仪,由此形成了内法外儒的“汉家制度”。这种由“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的政治体制重新建构起的汉代国家治理机制,形成了古代中国帝制二千多年的思想意识与政治文化。而西汉中期武帝时“甘泉卤簿”中“黄门鼓吹”的礼乐制度的兴起与修订,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与相关“礼制”的构建问题。

## 一、西汉前期君主集权政治与“甘泉卤簿”“黄门鼓吹”的关系

西汉武帝政治的最重要特征,即随着朝廷军功大臣及藩国势力的削弱,君相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

收稿日期:2023-03-28

作者简介:谢芳(1984—),女,湖北洪湖人,莆田学院中国音乐史专业教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历史专业博士后。

李禹阶(1953—),男,浙江绍兴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情况下,为了抑制宰相权力,一方面,汉武帝设置内朝,重用内宫那些较低级的官员诸如尚书、宦官,以及侍中、给事中等一些加官,使国家大政的讨论、决策权逐渐转移到皇帝身边人手中。同时,重用外戚,包括宫内宦者,形成了外戚总领内朝以控制外朝百官的局势。自此,内朝系统进一步扩大,并不断向外朝扩展。而当时武帝以内朝控制外朝之另一举措,便是学术取向之别,内朝侍从于朝堂之上,以辞赋辨折深通经术之外朝大臣。钱穆认为:“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经术,而内朝所贵侍从,则尽贵辞赋。大体言之,经术之与辞赋,亦当时学术界一分野也。”<sup>[3]98</sup>当代学者亦有对武帝时期把经学和辞赋作内外朝学术之分野的探索。例如成祖明就指出,汉武帝朝致力于“造作辞赋博尽奇异,构建帝国新礼乐文化”,因此“汉武帝率领言语侍从之臣大作辞赋,我们当从更深的层面来理解。汉武帝作为大有为之君,他既要有一代之学术思想,必然要求有一代之礼乐文化”<sup>[4]174</sup>。故综观武帝朝之政治文化建树,其不仅在儒家倡导下全面实行三纲五常的礼仪制度,而且在宫廷帝制礼仪的构建中,也利用礼乐制度的改革来强化帝王的无上权力。这种礼乐制度改革,还不仅限于经学和辞赋的学术取向的差异,也表现在汉代宫廷礼乐、威仪即标志帝王权威的“黄门鼓吹”中。

汉武帝时期“甘泉卤簿”中“黄门鼓吹”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汉代礼制史上,“黄门鼓吹”是强化帝王尊崇的重要手段。故汉武帝时的“甘泉卤簿”中关于“黄门鼓吹”的问题,尽管表现为礼乐制度的修订,但是它的本质却不只是涉及黄门鼓吹“俗”“雅”性质演变的问题,更关乎鼓吹乐与汉代集权建制的关系问题。它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西汉中期一种新权力意识与君主集权制下的政治文化问题。

正是在武帝朝重视礼乐以尊崇皇权的背景下,汉代礼乐制度大兴。例如《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所述内容,即透露出与武帝时期多项改制成果的勾联。如“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中的郊祀改制、“黄门前部鼓吹”中“黄门”称谓所牵涉的服色改制(“色尚黄”)与职官制度(“黄门”乐人)。特别是“黄门鼓吹”的文本书写,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反映了当时改制以加强君主集权体制的内容。可以说,“甘泉卤簿”之“黄门鼓吹”在武帝朝的集权体制建设中“应需而生”,且是当时多项改制而催生的产物。

因此,如果我们从政治、礼乐制度演变的角度,透视“甘泉卤簿”与“黄门鼓吹”的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礼制问题,而是一个汉代中期政治、礼乐制度与当时政治上适应皇权需要而进行“改制”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中,结合鼓吹乐规制的调整与服色改制过程,梳理“黄门”称谓的出现时间以及“黄门”与“鼓吹”结合的时间,进而推论汉代“黄门鼓吹”的出现时间,以及根据武帝朝郊礼改革“制不相复”的核心表现要素(郊祀地点、郊祀对象、郊祀卤簿)讨论“甘泉卤簿”的产生情境与时间,由此从权力博弈与集权建设的角度分析汉武帝朝“甘泉卤簿”与“黄门鼓吹”相结合,是十分重要的。

## 二、武帝朝的“改制”与“黄门”“鼓吹”的出现

仅从名称着眼,即知汉代“黄门鼓吹”包含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即“黄门”“鼓吹”及“乐人”,而这三者都是牵涉汉廷制度。故基于制度角度的考察即是研究“黄门鼓吹”出现时间的路径之一。

### 1. 汉廷“鼓吹”的出现

“鼓吹”一语始见汉初,《汉书·叙传》说:“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牛马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边雄,出入弋猎,旌旗鼓吹。”<sup>[5]4197-4198</sup>汉初鼓吹属民间之乐,使用者是边民班壹。班壹,楚王室后裔,秦末汉初战乱而避地楼烦,修整储力,“以财雄边”,后遂为“边地之雄豪”。班壹之“旌旗鼓吹”之乐,当同班壹身世及楼烦马上奏乐习俗有关。楚王室后裔之班壹,熟谙先秦礼乐之道。春秋晋楚之争,“晋文公振旅,奏恺乐以入于晋。”“恺乐”“献功之乐”<sup>[6]791</sup>,在建威造势上功效独特。而“楼烦”,本北方胡地,《史记·赵世家》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索隐》:

“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sup>[7]1809-1810</sup>《史记·匈奴列传》亦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sup>[7]2883</sup>。作为游牧族群，因逐水草而居，生产生活方式练就善骑射之马背功夫，弋猎禽兽，常年生活于马背而形成马上奏乐的习俗，故有“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之说。

继《汉书·叙传》后，“鼓吹”一语再次出现则是到了武帝朝。班固《西都赋》：“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警厉天，鸟群翔，鱼窥渊。”<sup>[8]1348</sup>《三辅黄图·池沼》：“池中有龙首船，（汉武帝）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sup>[9]249-252</sup>《后汉书·高句丽传》：“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sup>[8]2814-2815</sup>《太平御览》卷五六七引《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平百越，始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凡七郡，立交州刺史以统之。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sup>[10]294</sup> 以上资料显示，鼓吹乐入主宫廷，当始自汉武帝。此时的“鼓吹”，被用于皇帝主持的各项政治活动之中，如帝王的苑馆宴乐、边疆辖区治理等，其政治功能显著增强，明显有别于汉初班壹“以财雄边”“旌旗鼓吹”的财富象征。

上述情况表明，西汉“鼓吹”由民间收归中央，成为王室专用之物的时间，很可能就在武帝朝。这与汉初商贾政策的变革不无关系。据颜师古《汉书》“旌旗鼓吹”注云：“国家不设衣服车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sup>[5]4198</sup> 所谓“国家不设车服之禁”，《汉书·食货志》中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sup>[5]1153</sup> 由此理解颜氏之意，民间鼓吹乐的出现及禁用，与历朝的商贾政策有关：高祖时期，商贾受严厉管控，班壹“富甲一方”及“以财雄边”的举动，定是朝廷的管制对象；孝惠、高后时期，行松弛之制，班壹僭越体制的举动得以出现；武帝时期，商贾政策再次转向，不仅取消了弛禁政策，还颁发了一系列商贾禁令，例如勒令商贾缴纳车船税；禁止民间铸币；收回盐铁权，“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sup>[5]1166</sup>；均衡平准等等。尤其是以严厉手段打击正在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如颁布算缗和告缗令，“（元狩四年）（前119年）诸贾人未作贖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sup>[5]1166</sup>“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sup>[5]1167</sup> 不难看出，武帝朝商贾管控之严厉远甚于高祖时期。据此来看，《汉书》“鼓吹”活动场域的变化，即：从孝惠、高后时期的民间“鼓吹”到武帝朝的宫廷“鼓吹”（且民间鼓吹未再见记载），应与朝廷商贾管控政策的变化有关。

武帝朝对商贾的严格管控，是与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化有关的。早在战国时期，法家商、韩等人在政治上反对世卿世禄的宗法血缘制及贵族制，积极倡导君权专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性。为了达到这种一体化政治体制，他们反对、打击与君主制相游离、对抗的非政府社会力量，包括当时蓬勃兴起的民间农牧工商等个体经济及文学、游侠之士。而重农抑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重农抑商，从另一个侧面扼杀了民间工商业者滋生的基础。用国家力量的行政干涉去消解民间经济无序力量的产生，实际是垄断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及流向，只允许社会资源及财富的分配在宗法等级秩爵内进行，禁止多余的社会财富储于民间而形成的与宗法等级秩爵制相游离的另一政治、经济的无序力量。而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措施就是“盐铁官营”，达到“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sup>[11]59</sup>的目的。所以，武帝朝商贾管控政策的变化正是以“礼乐之制”加强君主集权制的一种措施。

因此，从颁发商贾禁令的时间轨迹来看（“元光六年”（前129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元鼎三年”（前114年）——“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朝的改制与管控举措始于即位之初，由此推知，民间“鼓吹”收归至中央，很可能也是武帝即位初之事。

## 2. 秦至汉初的服色改制与“黄门”称谓的出现

“黄门”，初义指“禁门”“凡禁门黄闕，故号黄门”<sup>[12]123</sup>。“禁门”出自皇宫门禁制度与宿卫制度。“禁中者，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sup>[13]3</sup>“黄门”何时出现，学界有两说。一说始于秦，其依据是职官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有“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sup>[5]739</sup>之语，后代史书与

现代学者大抵沿袭此说。另一说始于汉武帝,认为“史籍记载‘黄门’一语最早出现在武帝元朔、元鼎年间”,且“当时宫内的禁门已涂为黄色,随即有关的官职也加上了‘黄门’的名称”<sup>[14]5</sup>,其依据是服色制度。本文认为,就记事用词时代言,后一说与史载更吻合。下面再就“黄门”始于元朔、元鼎年间及服色改制背后的权力博弈再做些探讨。

### (1) 秦至西汉初的服色改制与权力博弈

秦至西汉初王朝服色之制,经历了秦“尚黑”,汉高祖“尚赤”、后“尚黑”、后又“外黑内赤”,文帝“尚赤”,武帝“尚黄”的改制过程。秦始皇一统天下,“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sup>[7]237</sup>高祖元年(前206年),“以十月至灊上,与诸侯平咸阳,立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尚赤。”<sup>[7]1378</sup>前202年,高祖称帝,在张苍的提议下,再次承袭秦制,改“尚赤”为“尚黑”,“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sup>[7]2681</sup>。据《史记·封禅书》,高祖的服色改制,“尚赤”“尚黑”之后还经历了“外黑内赤”的阶段<sup>[15]17-23</sup>,“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sup>[7]1381</sup>文帝即位,贾谊提出改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贾谊重在“更秦之法”<sup>[5]2222</sup>,全盘检讨与变更秦制。对此,汉文帝颇为赏识且有提拔之意,“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然文帝初及帝位,皇权未稳,开国功臣对贾谊亦有不满,“(贾生乃)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只能取“亦疏之,不用其议”的态度<sup>[5]2222</sup>,贾谊“色尚黄”倡议不了了之。后鲁人公孙臣再提议改“尚黑”为“尚黄”,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sup>[7]1381</sup>旧臣张苍仍坚持“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的高祖旧制。但汉文帝既未依公孙臣之议实行“色尚黄”,亦未采纳张苍,沿用“色尚黑内赤”之制,而是采用了立汉之初“色尚赤”的服色制度。“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時祠,衣皆上赤。”<sup>[7]1381-1382</sup>其后,又因术士新垣平欺诈之事败露,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sup>[7]1383</sup>,服色改制终停滞于“色尚赤”阶段。景帝时,未有改制之举。武帝初即位,便着手改旧制,推新政,“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因实权在握,“治黄老言,不好儒术”的窦太后阻拦,改制议案不了了之,“诸所兴为者皆废”<sup>[7]1384</sup>。直至太初元年(前104年),“窦太后崩”,汉武帝摈除多方改制阻力,改土尚黄才得以实现。“夏,改汉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前104年)。”<sup>[7]483</sup>由上所述,知西汉文帝提出来的“改德为土”“服色上黄”,历经近百年,才在武帝朝改制中落实。

“服色”之制,不仅指衣服,亦包括宫室车骑,先秦已见。《周礼·春官·都宗人》“正都礼与其服”郑玄注:“服谓衣服及宫室车骑。”<sup>[6]827</sup>《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sup>[6]1506</sup>可见,武帝朝颁定“色尚黄”之服色即是制度改革,规定了包括与礼有关的衣服、宫室、车骑等物的颜色,以别于此前的秦制(黑色)及汉初旧制(赤色)。秦及汉初的崇尚色或是黑色,如“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或是赤色,“(文帝)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在此情形下,宫室门墙为黄色的可能性并不大。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以为,“禁门”称“黄门”应始于汉武帝朝。

需补充说明的是,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朝的“色尚黄”以典章制度的形式予以确定之前,汉武帝的亲郊活动已开始实践“色上黄”,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而衣上黄。”<sup>[7]1395</sup>不仅如此,禁门内某特定区域称“黄门”的时间甚至更早。

### (2) “黄门”称谓出现的时间——基于西汉典籍的考察

检视西汉典籍,“黄门”一词仅见于《汉书》,而《史记》及《新语》《新书》《盐铁论》《说苑》《新序》《扬子法言》等史籍无载。就《汉书》言,记武帝朝以前事未见使用“黄门”一词。

按朝序	《汉书》“黄门”用例	卷次
	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纂玄……。	卷一百下·续传下
	诏(吾丘寿王)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迁侍中中郎。坐法免,上书谢罪,愿养马黄门,上不许,后愿守塞捍寇难,复不许,久之,上疏愿击匈奴。	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上
	武帝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	卷六八·金日磾传
	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	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舩,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	卷五四·苏武传
武帝朝	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	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充即移书光禄勳、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	卷四五·江充传
	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交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	卷九七上·外戚传上
	征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卷六八·霍光传

武帝之后,“黄门”一语,废帝朝一见,宣帝朝四见,元帝朝八见。成帝朝十六见,哀帝朝十一见,平帝朝一见,王莽时八见。由武帝时所及“黄门”与以下事件有关: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或称《天子游猎赋》)并献予汉武帝之事,“初拟相如,献赋黄门”;吾丘寿王因犯法被免官后向武帝请愿“养马于黄门”以谢罪之事;金日磾与母、弟投汉被安置在宫中黄门署养马之事;武帝通西域后外域珍奇异物集于宫廷之事;苏武弟奉命抓捕宫中宦骑之事;武帝朝以来黄支国进贡汉廷之事;武帝宠妃赵婕妤之父犯法被处宫刑并任职中黄门之事;江充奉旨查禁王公大臣奢侈僭越行为之事;卫皇后遭遇巫蛊案之事;武帝委任霍光辅佐皇位继承人之事。在上述事件中,司马相如献赋之事应早于其他诸事。司马相如献《上林赋》的具体时间,大抵不出汉武帝初期。王先谦说:“开二郡事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相如已为郎数年,是献赋在武帝即位初矣。”<sup>[16]1185</sup>何沛雄认为该赋作于建元二年(前139年)<sup>[17]15-26</sup>;简宗梧认为作于建元四年(前137年),奏赋于建元末年<sup>[18]119-126</sup>;刘跃进则认为“《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最有可能”<sup>[19]5-6</sup>。由此推知,“黄门”之称始于武帝执政之初。

再结合秦至西汉初服色改制的历程看,始于武帝执政之初(建元、元光年间)的“黄门”称谓或早于“色尚黄”制度的正式颁定(元封七年/太初元年,前104年)。此一现象充分反映出武帝朝“色尚黄”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述,文帝朝最早出现以“尚黄”取代“尚黑”“尚赤”等服色旧制的改制主张,却因功臣集团的权力制衡而告吹,后再次延续高祖汉初“尚赤”制度,由此

与秦“尚黑”制度划清界限。武帝即位之初的改制主张同样遭遇反阻挠,但武帝并未彻底妥协,采取迂回推进策略,如于正式颁定前先在宫禁内区域称“黄门”、亲郊时“衣上黄”等。由是言之,西汉初“黄门”之“黄”所代表的尚色制度,自文帝朝始被提出后至武帝朝终被施行的过程,其实是权力的博弈过程,而结果是权力逐渐归于君主。

### 3. “黄门”乐人出现时间

前文已论,“黄门”称谓出现在武帝即位之初,而与“黄门”称谓有关的乐人“黄门倡”,同样始见于武帝时期。据《汉书·东方朔传》: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数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着树为寄生,盆下为数。”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晷。……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sup>[5]2844</sup>

该段资料记述了武帝乐倡郭舍人与东方朔争宠,其中提到“上令倡监傍舍人”(“倡监”一职)。《汉书新证》云:“倡监谓黄门倡监也,当属于黄门令。西汉九卿属官有令丞,令丞之下往往有监,百官表不载监之官名。”<sup>[20]353</sup>可知,武帝朝已设“黄门倡监”。结合《汉书·东方朔传》述东方朔官职变化时间推知,此事当发生在建元元年(前140年)至三年(前138年)间。建元元年,“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初来,上书曰:‘……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上伟之,令待诏公车,俸禄薄,未得省见。”<sup>[5]2841</sup>又,“上知朔多端,召问朔:‘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sup>[5]2843</sup>后“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建元三年(前138年),东方朔因上《谏起上林苑疏》被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sup>[5]2851</sup>也就是说,汉武帝即位之初,已有黄门倡监一职。就其职权看,黄门倡监所管辖范围包括黄门倡员,如幸倡郭舍人等。

综上所述,宫廷“鼓吹”始于武帝朝,“黄门”称谓亦见于武帝朝,“黄门”乐人也出现在武帝朝,三者与改制当不无关系。从制度角度看,此三要素——宫廷“鼓吹”、“黄门”称谓、“黄门”乐人在武帝朝之前均不见,那么,此前出现“黄门鼓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再从秦末汉初改制看,武帝力推宫廷“黄门鼓吹”可以说它是武帝改制理念或改制实践的产物。因此,我们认为“黄门鼓吹”出现于汉武帝即位之初。

## 三、西汉前期郊祀改制与“甘泉卤簿”

甘泉泰畤郊天、汾阴后土祠祭地,是汉武帝新立的两大汉家祭礼,前者立于元鼎五年(前112年),后者立于元鼎四年(前111年)。《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sup>[5]1045</sup>两大郊祀礼制的建立,是汉武帝“创业变改”以使“制不相复”的核心成果。具体而言,郊礼“制不相复”包括了郊祀地点、郊祀对象与郊祀卤簿。

### 1. 郊祀改制:甘泉“太一”和汾阴“后土”

汉武帝改制郊礼前,西汉王朝基本延续秦王朝雍畤祭天帝的传统。据《汉书》载,高祖立汉,在秦朝雍畤四帝的基础上,增立黑帝北畤,但未曾行亲郊礼,而是“召故秦祝官”“如其故礼仪”。文帝即位,始亲祀雍畤五帝,又经术士新垣平建议,于渭南、长门分立五帝庙、五帝坛,“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祠以五牢具”。后新垣平方术败泄欺诈被诛,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雍畤、五帝庙、五帝坛复领于祠

官,不再亲祀<sup>[7]1383</sup>。景帝时期,因袭文帝亲郊雍峙五帝的传统,“(中元)六年(前144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峙”<sup>[5]148</sup>。可见,西汉初郊礼改制以增更为主,郊祀地点与郊祀对象未彻底革新秦朝传统。降至武帝,随着改制的推进,汉代国家祭礼进入重大变革时代。武帝新立天地之祭——甘泉郊太一与汾阴祠后土,以全新的地点与对象成为汉家独有。

### (1) 郊祀地点:“甘泉”和“汾阴”

甘泉,位于云阳县甘泉山脚,武帝前曾是异族部落的祭天场所。据《史记》《汉书》,云阳甘泉曾有“休屠祭天金人”一事。《史记·匈奴列传》:“(元狩二年)(前121年)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曹魏时孟康说:“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sup>[7]2908</sup>由此言之,云阳甘泉的宗教性由来已久,且春秋战国时期此处的祭祀主体一直是异族。

秦汉帝国建立,随着疆域版图的调整,甘泉的地位与性质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武帝征服匈奴前,甘泉一直是秦汉都城的北界以及西汉初防御北侵的军事要地,其宗教性转而为军事性,如文帝两次巡行甘泉宫,备战匈奴<sup>[5]119,123</sup>。经历元朔、元狩年间的匈奴反击战,匈奴远遁,甘泉的军事防御性减弱。同时,武帝在此展开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着力经营,“(元朔五年)(前124年)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sup>[7]1387-1388</sup>“(元朔六年)(前123年)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sup>[7]1388</sup>“(元鼎五年)(前112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sup>[5]185</sup>“(元封二年)(前109年)作甘泉通天台,长安蜚廉馆”<sup>[5]193</sup>,并“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sup>[7]1400</sup>。不难看出,武帝一朝以祭祀为主题的系列建设,使云阳甘泉再次回归宗教性。

由此可知,尽管甘泉作为祭天场所并非始于汉武帝,但经武帝重塑后的甘泉,其宗教面向与内涵已焕然一新,不再是异族祭、部落祭之处,而是我族祭、国家祭之所。此重要转变使云阳甘泉成为彰显武帝改制理念(“制不相复”)的关键要素之一。

汾阴,河东郡属县,位于长安东北。武帝选址汾阴祭地,与该处地望及祯祥有关。关于地望,独特处有二,一是属地冀州的历史地位,二是汾阴的地形地貌。河东汾阴,秦时属冀州<sup>[21]75</sup>,武帝诏书中后土祭祀也多与冀州并提。《汉书·武帝纪》诏曰“祭地冀州”,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阴,汾阴本冀州地也。”<sup>[5]183</sup>后又诏曰:“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睢坏乃显文鼎,获荐于庙。”冀州,《禹贡》九州第一州。相传夏禹治水,以足迹划天下为九州<sup>[6]1933</sup>,冀州居九州之首,有“禹行自冀州始”之说<sup>[7]52</sup>。《禹贡》将冀州排首位的原因,后人说法基本一致,即:冀州是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中心<sup>[22]55</sup>。汉武帝定汾阴为祭后土之地,应与此历史意蕴有关。另,汾阴是汾河与黄河共同冲击形成的高地,有“睢丘”地貌,该地面积广、地势高<sup>[7]462</sup>,是“泽中方(圆)丘”祭地的绝佳场所。

关于祯祥,《汉书·郊祀志》载:“天子东幸汾阴。汾阴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阴睢上,如宽舒等议。”“有光如绛”之祯祥吉兆,使汾阴成为郊祀地点的直接原因。文帝曾在此立庙,《史记·封禅书》新垣平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sup>[7]1383</sup>文帝所立祠庙,文献无考,但其“出周鼎”与武帝择此地之意图不同。显而易见,文帝朝的汾阴,因皇帝“欲祠出周鼎”的意图以及“使使治庙”(帝王未亲郊)的行动,未能成为国家祭祀的焦点。直至武帝时期,汾阴终因皇帝“以与上帝答”的改制理念与频繁亲郊的身体力行进入王朝郊祀系统,并被赋予了全新的性质。

### (2) 郊祀对象:“太一”和“后土”

“太一”,先秦已有论述<sup>[23]207-234,[24]207-234,[25]82-84</sup>,但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则是汉武帝朝之事。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承袭旧制始亲郊祭雍五帝,之后,便有方士不断鼓吹“太一”之贵。初有亳人谬忌进言“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武帝采其议,立坛于长安东南,但并未亲郊,“令祠官领之”。后有游水发根言“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汾阴获鼎,有人

再次进言“五帝,太一之佐也”并提议“立太一而上亲郊之”,武帝仍“疑未定”。此时,齐人公孙卿宣称黄帝获鼎乘龙登天长生不死,武帝闻之触动不已,感叹“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躡耳”,随即下令建置太一祠坛于甘泉宫,“始郊拜太一”<sup>[7]1393-1394</sup>。至此,太一神取代雍時五帝,成为汉家的至尊上帝。

“后土”,自战国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与皇天上帝并列的神祇,《司马法·仁本》曰:“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sup>[26]12</sup>《左传》:“晋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屡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sup>[6]1806</sup>但,秦及汉初的最高国家祭祀中并无后土之祭。直至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议立后土祠,以与上帝应答,后土神才被奉为国家最高地祇之祭祀。《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坛一黄犍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sup>[7]461</sup>是年,武帝首次亲祭后土。

综上可知,“甘泉”与“汾阴”、“太一”与“后土”,作为祭祀地点、祭祀对象被提出的时间,皆早于汉武帝朝,但它们正式进入王朝郊祀体系,则是武帝元鼎年间之事。

## 2. 郊祀卤簿的产生

“卤簿”之名,始于秦汉<sup>[27]38</sup>。关于其意,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卤簿”详解如下:“輿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大驾、小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仪。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櫓,音义皆同。卤以甲为之,所以扞敌。贾谊《过秦论》云‘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是也。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则按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由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卤簿,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簿之名不容别有他义也。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盖臣下侍从至尊,各供所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故谓之扈从耳。”<sup>[27]38</sup>上段释文指出,“卤簿”之名一与兵器有关,二与次第有关。“卤”,大楯,御敌兵器也;“簿”,卫从次第记录在册,故称“簿”,有次第行列井然有序之义,队伍特具的仪式性由此产生。“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言卤簿,是举凡也”,以“卤簿”称“仪卫”,可见其“仪式”与“防卫”之双重属性。

兼具护卫与展演职能的郊祀卤簿,是汉武帝甘泉/汾阴郊祀礼制的产物,始于元鼎四年汉武帝的汾阴亲郊礼,次年用于甘泉郊泰時,并成为武帝甘泉、汾阴亲郊仪式的重要构成。如前所述,武帝新立两处郊祀地点,甘泉与汾阴,都未选址长安近郊,长安至郊祀地点的空间距离由此产生。武帝行甘泉汾阴亲郊礼,需跋涉百里方可抵达坛场,途中护卫措施自不可小觑。与此同时,浩浩荡荡的亲郊队伍行进于郡县治道,于沿途百姓而言自是可遇不可求的盛大景观。也就是说,防卫措施与展演效果是帝王亲郊队伍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具双重属性(防卫性与展演性)的“卤簿”,成为武帝行亲郊礼的必需之物。

综上所述,“甘泉卤簿”是集中展现汉武帝改制理念的核心成果,其三大构成要素,即郊祀地点(“甘泉”/“汾阴”)、郊祀对象(“太一”/“后土”)、郊祀仪仗(“卤簿”),通过历史意义的更新、新事物的创立等运作逻辑,践履着汉武帝“创业变改”以使“制不相复”的改制理念。

## 四、武帝朝“甘泉卤簿”与“黄门鼓吹”相结合的原因分析

以往的研究对《西京杂记》“甘泉大驾卤簿”(下文简称“甘泉卤簿”篇)之“黄门鼓吹”是否西汉武帝朝之制颇有争议,且缺乏深入剖析与有力论证。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西汉“黄门鼓吹”缺乏确切的时间记载;其二,现有研究缺乏制度、政治角度的关照。本文以为,“甘泉卤簿”篇的书写对象是卤簿制度,且“黄门鼓吹”的书写涉及多项制度的勾联,如服色制度、职官制度、郊祀制度等。制度时间的爬

梳不仅可以弥补“黄门鼓吹”无确切时间记载的缺憾,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申论提供思路与素材,制度建设的探讨还可拓宽“黄门鼓吹”及汉宫音乐的研究视域与研究范围。本文通过分析与讨论“甘泉卤簿篇”之“黄门鼓吹”所涉制度的改制时间、理念与历程,得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从时间角度言,武帝朝的“甘泉卤簿”具备了用“黄门鼓吹”的前提条件。“黄门鼓吹”的三个构成要素,即宫廷“鼓吹”“黄门”称谓以及“黄门”乐人均始于汉武帝即位之初,“黄门鼓吹”的出现时间大致可界定于此,即元光年间。“甘泉卤簿”是甘泉、汾阴郊祀的产物,始于元鼎四年武帝亲郊汾阴礼。“甘泉卤簿”出现之前,已有“黄门鼓吹”。

第二,从改制要素与理念言,“甘泉卤簿”配备“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彰显其改制理念的理想组合。首先,“黄门鼓吹”的构成要素(“黄门”与“宫廷”鼓吹),以及“甘泉卤簿”的构成要素(郊祀地点甘泉/汾阴、郊祀对象太一/后土),无一不在体现武帝朝“创业变改”以使“制不相复”的改制理念。“黄门”,西汉武帝朝服色改制的成果,西汉国家“尚色”制度从高祖“尚赤”、后“尚黑”、而后又“外黑内赤”到文帝“尚赤”,再到武帝“尚黄”的改制,依次体现了高祖承袭秦制、文帝承袭祖制、武帝力改秦制及祖制的建制思路与理念。“宫廷”鼓吹,武帝朝变改商贾政策、制定“车服之禁”的产物。汉初,在孝惠、高后“弛禁”“不设车服之禁”的政策下,边民班壹用“鼓吹”仪仗夸耀财势,称霸一方。随着武帝朝商贾管控举措的不断升级,“民间”鼓吹转为“宫廷”鼓吹,鼓吹乐变身为王室之物,成为区辨身份等级的物件。郊祀地点“甘泉/汾阴”,郊祀对象“太一/后土”,经武帝朝的重塑与确定,皆表现出崭新的面貌与意义。继而,“甘泉卤簿”是汉武帝一手炮制的仪式空间,与生俱来的移动性与展演性使其成为宣扬武帝改制理念的的活动空间,“甘泉卤簿”配备“黄门鼓吹”(表达武帝“创业变改”以使“制不相复”改制理念的物件集合体)由此成为必然。

第三,从改制历程中的权力博弈与集权建设言,“甘泉卤簿”配备“黄门鼓吹”是汉武帝展示集权建设成果的理想组合。“黄门鼓吹”所涉服色制度、“甘泉卤簿”所涉郊祀制度的改制历程,无一不是权力博弈的写照。就服色制度言,“色尚黄”的倡议肇始于文帝朝,文帝的改制念头终因帝权根基未稳无力抗衡朝中功臣集团而不了了之。武帝即位初推行的新制改革同此遭遇,直至抗衡势力核心人物窦太后的离世,此局势才得以扭转。可以说,“黄门鼓吹”因其构成要素的改制历程而被注入权力象征的内涵:“黄门”,作为称谓,是武帝推行服色改制的前期铺垫;作为职官,“黄门”乐人是众多乐人中与皇帝最为亲近的群体;“宫廷”鼓吹,因汉武帝的权力收归才有民间至中央的“华丽变身”。就郊祀制度言,甘泉/汾阴郊祀礼是武帝一手炮制的汉家天地祭礼,郊祀地点、郊祀对象、郊祀卤簿,均史无前例。大刀阔斧地推行改制,有效的权力操控是关键。“黄门鼓吹”与“甘泉卤簿”的结合,可谓是武帝集权力于一身的成果展示。

## [参 考 文 献]

- [1] 熊十力. 读经示要. 萧蓬父主编. 熊十力全集·第三卷[N].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 何怀宏. 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并非秦制[J]. 环球人物,2014(5):1-16.
- [3] 钱穆. 秦汉史[M]. 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
- [4] 成祖明. 汉武帝西京变局与汉代儒学建构[J]. 中州学刊,2009(5):172-177.
- [5]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0] 李昉. 太平御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11] 桓宽. 陈桐生译注. 盐铁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2] 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3] 蔡邕. 独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 宋杰. 黄门与禁省:汉代皇帝宫内居住区域考辨[J]. 南都学刊,2020(5):1-16.
- [15] 陈鹏. 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考[J]. 史学月刊,2015(4):17-23.
- [16]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7] 何沛雄. 汉魏六朝赋论集[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 [18] 简宗梧. 汉赋史论[M]. 台北:东大图书股份公司,1993.
- [19] 刘跃进. 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10.
- [20] 陈直. 汉书新证(第二版)[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 [21] 李零. 禹蹟考——《禹贡》讲授提纲附“九州对照表二”[J]. 中国文化,2014(1):57-59.
- [22] 管宗昌. 秦汉时期杂家作品对“九州说”的改造[J]. 殷都学刊,2013(2):54-58.
- [23] 钱宝琮. 太一考. 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 [24] 李零. “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M]//中国方术续考.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25] 田天. 秦汉国家祭祀格局变迁研究——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为中心[D]. 北京:北京大学,2011.
- [26] 司马穰苴著,黄向阳译注. 司马法[M].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
- [27]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 封氏闻见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A Study on “Yellow Gate Advocacy” in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s “Ganquan Brine Book”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Xie Fang Li Yujie

(College of Music, Putian University, Fujian Putian 351100;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remonial system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Yellow Gate advocacy” really embodied a new concep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eremoni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mperor Wudi Dynasty, and also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archy’s autocratic centralized syste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the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al histor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nges of the vehicle system, dress system and suburb system involved in “Ganquan Brine Book”, and discusses the prerequisite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intersection of Emperor Wudi’s dynasty with “Yellow Gate Advocate” and “Ganquan Brine Book” around the time, elements, ideas and course of the reform. It believes that “Yellow Gate Advocate” is Emperor Wudi’s use of “Ganquan Brine Book” to promote the reform idea. The ceremonial instruments and necessary things showing the results of the centralized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totalitarian monarchy of Emperor Wudi of Han Dynasty.

**Keywords:** Emperor Wu; Ganquan Brine Book; Yellow Gate advocacy; clothing system; suburban sacrificial system

[责任编辑:刘力]